

“习惯性怀疑”已成社会病态



■ 唐钧

最近,《人民论坛》的编辑邀请我撰文参加一个讨论,要对被他们列为十大“社会病症”的“习惯性怀疑”做个评析。编辑给“习惯性怀疑”所下的定义是:“由于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危机,安全危机,生存危机,健康危机等等,对社会产生恐惧,食品不安全,骗子太多,医生不可信等等,因而,面对一切,首先就是怀疑,因而成了习惯,怀疑所有人,所有事,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感,缺乏安全感。”显而易见,这个定义对一些当代中国社会常见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概括性的描述,但并没有通过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,进一步揭示“习惯性怀疑”的本质。

以“怀疑”作为讨论的对象,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的议题。在这个问题上,心理学家们的讨论已经延续了几个世纪,并历时性地分成了“精神分析”学派、“行为主义”学派、“认知科学”学派、“人本主义”学派,等等。在哲学家那里,相关的争辩可能要追溯到公元前,那时就有“学园怀疑主义”和“皮浪怀疑主义”等不同学派;而到了现代,则有怀疑主义和可靠主义等流派林立。

当然,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的不是这些关于“怀疑”的学术问题。根据要求,是要有针对性地质剖析作为“社会病症”的“习惯性怀疑”。但是,如果我们不能实事求是地分析这种“不良习惯”形成的来龙去脉及其根源,只是肤浅地故作痛心疾首状写篇“大批判文章”,实则令我们自己也陷入了“怀疑论”。“习惯性怀疑”是一种“社会病症”。本质上可能是“习惯性”地讨厌“被怀疑”,亦即讨厌自己不被信任而已。

就常识而言,我们对存在于其中的这个星球的认知,主要来源于我们的经验。所谓经验,顾名思义,大概可以解释为以往的经历和体验,这可以被命名为直接性认知。直接性认知,靠的是我们的感官,靠我们的听觉、视觉、嗅觉、味觉和触觉,即靠耳闻、目睹、鼻嗅、口尝、加上皮肤的感触,由此得到的形形色色的信息进入大脑进行综合加工,从而形成了我们自己的经验。除此之外,还有一种认知渠道是间接性的,就是通过种种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媒体,从最原始的言传身教,到最现代的通讯技术。汲取别人的经验。然后,通过大脑的加工,变成自己的经验。

为何只同居不结婚的男女越来越多

■ 文 / 胡阳

近日,参加一企业的年终庆典,席间遇到一位久未谋面的异性朋友茵茵,她今年 36 岁,原以为她已经结婚成家,但在与她的交谈中得知,以前谈了几个男友,由于找不到感觉,都是恋爱交往一段时间后分手。如今谈的这个男友也快 5 年了,至今她还没有想走进婚姻殿堂的打算。问其原因,她一句“我单身,但不独身;我有伴侣,但不想结婚”的回答让人惊讶!用她的话说,她就是只想恋爱而不想结婚。那么,为什么年纪不小的她和男友在一起同居就没有结婚的想法呢?

无独有偶,笔者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份婚姻调查的报告显示,超三成女性只想同居不想结婚的比男人多一成。在具体原因上,他们不想结婚是害怕承担家庭责任,离婚率太高、害怕失去自由。老实说,这有违常理的婚姻观念,不能不让人对婚姻内涵作全新思考。我们知道“男大当婚女大当嫁”这句在中国流传了千百年的婚嫁俗语,意思很明显,不管是谁,到了适当的年龄就该结婚成家,生儿育女。这有如“人不能任意改变、创造或消灭自然规律”一样,违背常理终究要付出代价。

然而,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,人们生活方式多元化,越来越多属于婚龄的年轻男女迟迟不愿跨入婚姻这道门槛,而这日益增多的“只想同居不想结婚”现象,已俨然成为一道都市风景,这种婚姻观念被越来越多的认可,就大大超乎人们的想象。诸不知,过去人

验。

当我们通过直接的渠道和间接的渠道获得经验之后,我们会将其进一步加工,使其产生一种定型化效应,即形成刻板印象。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经验,类型化地来辨识我们此后所遇到的万事万物,这可以帮助我们以更快的速度去认识大千世界。

一般来说,刻板印象是一种稳定不变的认知途径和思维方式。但是,当我们所遇到的事物与我们以往的印象对不上号时,就会产生疑问,继而就会想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。类似这样的质疑可能有三个方向:

其一,反思我们的感觉是否出现了问题;

其二,反思我们以往的经验是否出现了问题;

第三,没有确定方向的发散性检讨。如果我们能够很快地找到问题的答案,那么疑问就会消除。

如果我们一时半会找不到答案,疑问就成为悬疑。这样的话,以后再遇到相同情况时,由于即时的感觉或以往的经验似乎不再可靠,怀疑就产生了。

有一些民间传说给我们描述了怀疑或被怀疑的过程,譬如众所周知的“狼来了”的故事。放羊的小孩闲来无事,想“逗你玩”,于是便大喊“狼来了”。村里父老乡亲听到呼救声,忙抄家伙前来救援。但到了地头,却不见狼的踪影。看着大人的惶急状,小孩哈哈大笑,乐得不可开交。这样的“逗你玩”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发生,有一天真的狼来了,小孩喊破了嗓子也无人前来,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。

这个故事说的实际上就是个怀疑和被怀疑的过程。在大人的经验中,狼是要吃羊甚至要吃人的,所以每逢小孩叫喊“狼来了”,便急忙赶来救援。小孩也从大人那里间接地习得了同样的经验,于是他便不知深浅地利用这样的间接经验来给自己解闷。但是,大人在再三扑空之后,感觉被耍弄,于是形成了新的刻板印象,小孩在说谎,于是他就不再被信任。真所谓“假作真时真亦假”,到头来,大人的经验从真假难分直到真假不分,被怀疑的小孩和他的羊群就成了灰太郎的盘中餐了。

中国人认为,人心“本善”且性情“相近”,是后天习得的差异使人的性情逐渐“相

远”,故有“苟不教,性乃迁”的说法。所以,当我们发现在一个社会中“怀疑”已经成为“病态”的“习惯”时,恐怕首先要反思和检讨的是为什么会“被怀疑”乃至“不被信任”。

以中国社会中的一个几乎成为“死结”的社会问题,即医患关系为例,来作进一步的分析。医患关系,是一种生死攸关的重要的社会关系,这种关系本应是建立在人文关怀和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的。但是,在医改过程中,过度的经济主义和管理主义的“改革思路”,使中国社会的医患关系一步一步地走进了死胡同。若要反思,政府部门、医护人员、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

先说社会公众,现在相当多的人都对医疗服务表示不信任,认为医院和医护人员就是为了赚钱。于是便引申出一种新的刻板印象,不肯出钱或出不起钱,就得不到好的医疗服务。于是,开大药方、过度检查、收受红包也都成了这种负面经验的一个组成部分。更麻烦的是,这种经验还得到了民间习俗的支持。中国古代有不少神医的传说,其本领大到就是死人也能给医活了。这些传说给一部分人一种信念,只要肯花钱,找到好医院、找到好大夫、找到好药,什么病都不在话下。但是,事实上,迄今为止,医学仍然是一门“经验科学”。

无论西医中医,其实对任何病人、任何病种的治疗均无百分之百的把握。何况医疗服务是人对人的服务,医患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。能否治好病,并不完全在医生的努力,还要看病人的生理、心理的素质以及病人和家属是否配合。所以,即使是古代神医,也是为自己设置了一道最后屏障的:我治得了病,但治不了命;病人死了,叫做命当该绝,于是一了百了。但是,现在无神论了,不相信命运了,这道最后的屏障便荡然无存,这便使由怀疑和不信任导致的医疗过程中的社会风险陡然增大。

再说医院和医生,当他们的收入大多来自于医疗服务的“创收”时,经济效益必然是首要的考虑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“非营利”只是一句空话。因为把医疗服务的经济运行看成是一个封闭系统,医改只在这个系统内做文章,这必然导致“压下葫芦浮起瓢”的结果。加上社会公众的一系列认识误区,再加上有“专业”的“医闹”的掺乎,医患关系的社

会张力是愈演愈烈。今天是病人亲属冲击医院,殴打医护人员;明天是医护人员静坐抗议,呼吁严惩凶手。当医院和医生不再被信任时,他们的自我保护也走向了极端。在与医患关系相关的方面,处处严防死守。但是,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自觉不自觉地把病人及家属放在自己的对立面,然而,诸如此类的社会关系,相互间越是不信任,充满了猜疑,就越难处理。

再说新闻媒体,毫无疑问,在揭开“医改不成功”的盖子方面,新闻媒体是起到了很大作用的。但这使一部分新闻记者和编辑产生了一个刻板印象,医疗领域是一个“新闻富矿”。更有甚者,在“人咬狗才是新闻”的心态下,某些记者不惜成为“医院狗仔队”。他们的无端猜疑甚至是编造假新闻,对医患关系的恶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当然,这样的恶果不但戮害了无辜的医院和医生,最终还会使新闻媒体本身也不被信任,成为政府部门、医护人员和社会公众怀疑的对象。

所有这一切,可能最后都要聚焦到政府有关部门身上。作为社会管理者,政府部门不能不对医患关系的恶化负最后的责任。首先是对医疗服务投入太少,造成医院和医生必须靠创收来维持运营。但这个经济上的口子一开,管理上必然难以约束。其次,医疗卫生的管理部门就把自己定位于全国医院的总院长,屁股指挥脑袋。看似处处为医院、医生着想,其实处处事与愿违。再次,把科学管理绝对化,幻想用所谓的大数据和绩效考核就能把医疗卫生事业管好,其实是懒政思维。可以说,如果光从经济主义和管理主义出发想问题,出政策,而把人文关怀,包括对病人患者的人文关怀和对医护人员的人文关怀置诸脑后,结果必然是越搞越糟,必然造成“政府—医院—公众—媒体”间的相互不信任和普遍的怀疑,进而进入一个恶性的死循环。

从以上对医患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到,充斥社会的不信任和普遍的怀疑从何而来。因此,政府部门、医疗服务、新闻媒体、社会公众都必须走出这种“纯经济”、“纯管理”、“纯技术”的迷思,回到医疗卫生的本质人文关怀上来,其实除此之外别无他路。医患关系如此,前文中编辑提出的“诚信危机,安全危机,生存危机,健康危机等等,对社会产生恐惧,食品不安全,骗子太多,医生不可信等等”,何偿不是如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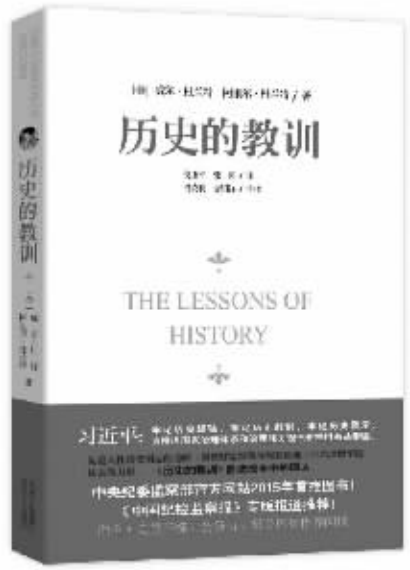
最后,要回答标题中提出的问题:“习惯性怀疑”是社会病态吗? 答曰:又是又不是。这令我联想到一则寓言:有个农夫把斧子丢了,怀疑是他的邻居偷的,于是便抵近侦察,发现他的一言一行简直都与偷斧子相关。但是,后来农夫的斧子在一个犄角旮旯里找到了,这时再看那个邻居,哪儿哪儿都不像偷斧子的了。

编辑所定义的“习惯性怀疑”,是否可以用这个故事的来诠释。但是麻烦的是,在当代社会里,如果这种抵近侦察参杂进了“利益”,事情就麻烦了。看人像偷斧子的刻板印象一旦形成,即使斧子找到了也不肯抹去,反倒将这种怀疑重新固化为经验。我们的政府、单位、媒体、公众,是否有这样的病态心理呢? 恐怕是有的,这更使有关怀疑的讨论复杂化。其实怀疑这个东东,哪有哲学家、心理学家讨论的那么纯粹。有时看到一些很商业化的“班”,专家们在教政府官员如何公关,如何应付媒体,总觉得有点好笑。用不信任应对不信任,这世界有个好吗?

红杏出墙。我有权利去选择男人,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”老实说,这些观点并非真空穴来风,如今持这样观点的人很多,其背后透露的问题是在追求男女平等的同时,越来越多的人婚姻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感情的空档被很多其它的生活乐趣所填补。于是乎,便理所当然出现了许多“只同居不结婚”的人。

再说在当今社会里,越是经历多的人,就是对婚姻没有足够的信心。因为他们看得多,经历得多,感受就会很复杂。在他们看来,既然婚姻不能给人以自由和快乐,那为什么还要拼命朝这座围城里钻? 也许茵茵“我有伴侣,但不想结婚”是一个极端的例子,但在中国,许多人视“同居”为很正常的的事情,甚至奉为从恋爱到婚姻的宝典。不管是由于无奈还是主动选择,中国的“不婚族”队伍正在逐渐扩大。虽还没有形成社会问题,但迟早会对婚姻和社会提出严峻的挑战。

当然,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只想同居不想结婚,恐怕不光是社会的原因,也有家庭的原因,更有自身的原因。毕竟如今的孩子大多是独生子女,在家长“富养”的观念下长大,大多缺乏责任感,把婚姻看得太悲观,认为婚姻是爱情坟墓。于是,他们认为结婚是在折磨自己,与其彼此结婚,不如慢慢相恋,既不用担心爱情的消失,又不用担心婚姻的营生。不过,当个人行为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时,我们考虑的就应该是对社会的影响。由事及人,由人及感,就不能不让人深思!



对当下中国的启迪与借鉴

——读威尔·杜兰特《历史的教训》

■ 古滕客

2015 年中纪委推荐的第一本书叫《历史的教训》,认为这是“值得静下心来,细细品味的作品”。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?我想,还是希望从历史看今天,为今天找路子,这对当下的中国,有着启迪与借鉴的作用。

《历史的教训》的作者是美国著名学者威尔·杜兰特夫妇。杜兰特在西方世界声名显赫,他和胡适都是大哲学家杜威的学生。这本书是他们夫妇长期读史、治史经验的积累与萃取,是他们对花了 50 年时间写就的《世界文明史》的注解,浓缩了 11 卷《世界文明史》的精华。全书通过提纲挈领的线条,勾勒出历史与人类生活各方面的关系,详细说明了地理条件、经济状况、种族优劣、人类本性、盛衰定律、生物进化等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,并总结出历史留给人们的巨大精神遗产。

历史证明,人性是改变国运的一种力量。杜兰特讲解了人类社会的战争、腐败、风气不良以及种种罪恶,分析了人性中的缺陷,说明腐败现象在人类社会上已经存在了很长的历史。腐败虽然有着复杂多样的原因,但深层的原因却主要是根植于人性,根植于人性中的消极层面,比如自私、贪婪、欲望、好色、妒忌、攀比等等,而人性变化得缓慢,则可能导致了腐败现象十分顽固,人类社会难以在短期内将其彻底铲除。人类文明史上的腐败、贪污、贿赂延绵不绝,并影响了社会风气、风尚,即说明了这个问题。这也让我们想到当下反腐工作的艰巨性、复杂性和长期性。

道德有一种塑造社会的力量,但道德规范不是一成不变。杜兰特认为,在狩猎时代,生存能力取决于孔武之人,好斗、残暴、贪婪和性能力都是让种群得以存续的优势。所以今天人们眼中的罪恶,很可能不是人类堕落时留下的耻辱标记,而是过去美德的遗迹。即使到了文明昌盛的现代,国家之间的战争也仍然与个人竞争有着相同的原因:贪婪、骄傲、对霸主地位和资源的欲求。区别仅在于今天的个人受制于道德和法律,国家则无此约束,故而纵观人类历史,兵连祸接,几乎无日无之。所以,要牢记历史的经验、教训与警示,因为历史才是最好的老师。

作为毕生治史的收官之作,杜兰特用高度浓缩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历史观。如,“社会的基础,不在于人的理想,而在于人性。人性的构成上可以改写国家的构成。”又如,“因为人类热爱自由,而在一个社会里,个人的自由是需要某些行为规范约束的,所以约束是自由的基本条件;把自由搞成绝对的,它就会在混乱中死去。”对此,季羡林先生这样评价:“因为它具有独立而深刻的见解,字里行间充满了一个哲学家的真知灼见。我要特别指出《历史的教训》,集中表达了杜兰特博士对文明史的独到见解。”

书名《历史的教训》隐含鉴古知今的寓意,其中许多教训都是历史经验的总结,通过格言、定律式的语言高度概括呈现出来。杜兰特并不满足于单纯分析各个因素与历史的关系,他真正的目的是,通过前面的内容,思考一个宏大主题:“真有进步吗?”“因为我们生来就有更丰富的文化遗产,生来便处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,知识和艺术积累的増加,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基础和支撑。”也就是说,进步不可能脱离开历史,不可能存在与历史决裂的进步,历史的借鉴作用和意义,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。

杜兰特夫妇不但是历史学家,也是文学家,有着下笔“常可与诗媲美”的美誉。他们曾预言:“中国很可能将会比美国富有,很可能将会与古代中国一样,在繁荣和艺术的生活方面,居于领导世界的地位。”他们观察的角度提醒我们,应当重视从广阔的历史、世界以及多学科视角,看待人类社会的文明演进,以及很多的具体现象,包括腐败和反腐败。所以,《历史的教训》值得我们仔细阅读,并进行深入的思考!